
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有效对接

——基于江苏省丰县梁寨镇的个案分析¹

陈承新

【摘要】 具有民族性和新旧交融性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辅相通。当前，各地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度不断提高，吸收利用传统文化的做法层出不穷，但也存在不少误区。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梁寨镇自觉放大当地汉文化较为丰富的特点并运用到社会治理之中，针对传承和利用传统文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作出了统筹规划；以历史资源复原或保存的方式，营造积极进取与和合文化相统一的外围治理环境；以发动社会力量资助教育和发起“双善双争”活动评比的形式，形成积极进取与和合文化相统一的内化引导机制；以建立乡贤工作室，调解多元矛盾、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难题为抓手，形成积极进取与和合文化相统一的外在文化治理载体，发挥了传统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对其他地区的社会治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传统文化 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 现代社会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7)05-0009-05

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传统文化是源自历史、影响或预示将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族文化。

一方面，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既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同时又包含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它既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同时又由其他不同的思想交融共铸。传统文化能够长期延续，反映和代表一个民族的社会整体意识和价值。因此，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能产生重要影响，其优秀部分滋养和形塑着积极向上、和谐向善的民族精神，其弊端或缺陷则造就了消极和落后的国民习性^[1]。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具有新旧融合的特点。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代代延续的，在这种发展与延续中时时发生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融^[2]。因此，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陈旧、静止、一成不变，它还寓含着当下对于历史的传承，甚至对于将来的影响和预言。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辅相通。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在其所处的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现实生活实践中，每一个社会成员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理念等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

¹收稿日期 2017-07-18

作者简介 陈承新，女，浙江杭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10002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深深影响着中华儿女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内化成了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体现在生活、工作、社会的各方面，成为每个中国人不可磨灭的民族印记和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作用和影响深远长久。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公德、社会认同和责任意识教育，有助于增强中华儿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因此，要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自觉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与法律法规、节日庆典、礼仪规范、民风民俗相衔接，与文艺体育、旅游休闲、饮食医药、服装服饰相结合，让传统文化更好地融入生活场景^[3]，融入社会治理过程。

二、当前我国农村吸收利用传统文化的主要做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各地对传统文化重视度的不断提高，当前我国许多地方吸收利用传统文化的做法层出不穷。例如，山西省闻喜县寺底村深入挖掘楹联文化资源，将楹联与人生礼仪、岁时节日、建房乔迁等特别的时间节点相结合，形成传承和弘扬乡土社会优秀伦理道德的特殊场域，对处理农村养老问题，推进家庭、社区和干群关系和谐以及传承传统文化均发挥重要作用^[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挖掘并规划了凤凰古城、里耶古城、芙蓉镇、老司城等传统古城和特色村寨作为文化旅游景点，确定“四月八”“六月六”“女儿节舍巴节”等差异性传统节庆活动的承办地点和活动内容，有意识地为本地各族群众互动搭建集中、有序、联动的活动平台^[5]；滚贝侗族乡也发掘并厘定了诸如侗族的“热伴节”、水族的“南瓜节”、苗族的“新禾节”、汉族的“甜杞节”等作为政府组织的节庆活动，同时以侗族文化为基点，还拟定了“七个一”民族文化工程，即每村修筑一座风雨桥、一座寨门、一座鼓楼、一个篮球场以及组建一支芦笙队、一支业余文艺队、一支篮球队^[6]。这些文化载体的建设促进了村屯群众之间的互动，增进了村民间的情谊，并在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中逐步消除、化解了各族群众之间的相互猜忌和防备心理。

尽管当前吸收利用传统文化的做法形式繁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传统文化的继承止步于形式，空谈文化。近年来，从新区开发到旧城改造，城乡建设和旅游开发吹起一阵复古风潮，一些地区称之为“新农村建设”或“古城复原”行动。如按原形制、原构造、原材料、原工艺精雕细琢还原的传统方式修建，这本来无可厚非，但目前国内仿古建筑基本停留在形式化模仿上，甚或本末倒置：一些地方拆真造假，推倒有内涵的古迹，转而新造假古董，简单粗暴地破坏了古建筑和文化遗产；一些地方则无中生有，仅仅依据传说、或是为了拍摄历史影视剧而兴修人工景观。这些所谓的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或“保护”的做法，实际上牺牲了原生态的传统文化，让文化流于形式、流于空谈。

第二，对传统文化的利用与社会治理相脱节，文化与基层治理“两张皮”。例如，滚贝侗族乡党委和政府传统民族文化的运用和发掘尚未上升到社会治理的框架调整和制度层面。许多地方政府也对规范性和非规范性的、与当今法治要义相吻合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开展改良、整合的活动缺少引导和深化，并未积极吸收优秀文化要素成为乡规民约的重要内容^[7]。

第三，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缺乏统筹规划。比如山西寺底村的楹联文化建设，仅局限于老年人的娱乐活动，带有一种自发参与社会治理的知识分子情怀，尚未将楹联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进行综合开发，且未能纳入县乡文化发展规划；主要参加者大多是一些退休教师、工人、干部等，缺乏文化传承机制；诗联学会基本上仍属于一种民间力量，缺乏固定化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8]。还有很多地区如河北地区，虽然本地传统文化具备显著的地域特征和知名度，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利用依然存在较大空缺。

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各地在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上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和思考。

三、江苏省丰县梁寨镇的实践特点：内外兼修

江苏省徐州地区长久以来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熏染，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和尚武、进取、彪悍的民风；同时，以和为贵，讲求和谐、和平、和顺以及传统孝道。因此，徐州当地的传统人文性格融合了传统文化的“软”和“硬”两个方面，

兼具追求进取与讲求和合的特点。在徐州市梁寨镇的社会治理中，我们看到这种汉文化的特点被自觉放大并融合进社会治理之中。

（一）追求进取的文化性格与乡村治理的对接

在徐州市丰县梁寨镇的社会治理中，汉文化追求进取的文化性格被不断强化，并被自觉运用和体现于社会治理之中。

一方面，深度发掘状元文化资源。徐州丰县

梁寨是徐州历史上的唯一状元李蟠的故乡。当地正深度挖掘状元文化资源，建设状元碑园、程子书院、配套仿宋古建筑群等。2000年，梁寨出土了文状元李蟠撰写、刻于康熙五十四年的石碑，载：“吾祖籍程子院。程子院者，宋明道先生（程颢）讲学处也。”^[9]程子书院曾经是北宋嘉佑年间程颢、程颐兄弟二人讲学的地方，目前也被修缮后作为旅游参观和举办文化活动的场所。梁寨镇正积极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不断营造耕读传家、学研进取的外在环境和氛围。

另一方面，发动社会力量奖励资助优秀学生，倡导学研进取。梁寨虽然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是徐州境内相对偏远地区，但是在重视教育方面丝毫不懈怠。为了鼓励学子勤学上进，该镇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每年向高考状元及考上大学的学生提供数量不等的奖励。当地的商会组织则每年组织民营企业走进梁寨学校，举办捐资助学献爱心活动^[10]。

（二）讲求和合的文化性格与乡村治理的对接

徐州市丰县梁寨镇的社会治理，不仅固化和强化了汉文化中追求进取的文化性格，而且汉文化中讲求和合的文化性格也得到放大和载体化，并体现和运用到社会治理工作中。

一方面，村村建有乡贤工作室，调解多元矛盾，改善社会治理，成为和合文化性格的外化体现。梁寨将表现出色的基层干部、道德楷模等先进典型和本土退休的老干部、老党员以及在当地有一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民间“大老执”，在外学者、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官员等，定义为现代意义上的乡贤，这样的人在梁寨有百余位，他们为当地的社会治理、社会和谐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何要成立乡贤工作室呢？现实社会治理的诉求使然。梁寨镇共有机关干部148名，农村家庭15317户^[11]，仅依靠镇机关干部的力量，则有太多问题处理不了，而村干部人熟事熟，村干部配合镇干部一道开展工作，能够显著充实和壮大基层工作队伍，提升工作成效。然而，一些村干部因长期的历史原因，在基层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矛盾，而农村普通党员和村民之间的矛盾较少、利害冲突较少，因而需要动员农村普通党员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梁寨全镇有1301名农村党员，自2013年11月开始，每人负责联系周边农户10至12户^[12]。即便如此，农村社会矛盾千差万别，非常复杂，难免遇到镇干部、村干部、一般党员也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从2014年开始，梁寨镇集中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楷模等先进典型以及本土退休老干部、老党员和在当地有一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民间“大老执”等百余位乡贤组建乡贤工作者队伍，20个行政村每村都建有“乡贤工作室”，为乡贤提供工作平台，发挥乡贤作用，同时，把“大老执”纳入培训和管理范围，使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乡贤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通常，乡贤在村里威望比较高，当地民众遇到矛盾和纠纷时，常常请村里威望较高的乡贤出面调解。乡贤们凭借人熟、地熟、事熟、村情熟等优势，对各种矛盾及时介入，用他们的德高望重和朴实的表达，春风化雨，促使矛盾就地化解。乡贤们也能够沟通民情和政情方面发挥作用。他们主动掌握并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广泛听取基层群众意见，为城镇建设和社会发展收集建议和意见；及时向群众传达政策，积极参与基层法律宣传咨询、治安防范等活动。

另一方面，开展“双善双争”活动，通过道德弘扬，形成和合文化性格的内化引导机制。梁寨镇作为历史文化小镇，深受

传统和合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和合文化基础。在建立乡贤工作室的基础上，梁寨镇党委和政府引导广大党员“善待群众，争做优秀党员”，引导广大群众“善待他人，争做梁寨好人”。“善待群众，争做优秀党员”，就是让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善待他人，争做梁寨好人”，就是号召全镇广大干部、群众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主动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方便，自觉为他人和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积极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风气好转贡献力量。

以孝道文化为例。首先，孝道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倡导孝道，可以有效发挥社会价值观的正向作用^[13]。梁寨镇为弘扬孝道文化，在渊子湖畔以民间众筹的方式树起了“二十四孝”雕塑，建起了“二十四孝”碑廊，推动形成好人辈出、好行成风、好人好报的社会风貌。其次，孝道对于家庭的和谐稳固和持久兴旺具有重要意义。家庭孝道氛围能使子辈、孙辈从小就对长辈尊敬和孝敬，维系家庭和谐，从而也有助于基层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梁寨镇每年在全镇范围内评选出10位好媳妇、好婆婆，以积极引导家庭成员的孝道，推动农村养老问题解决。第三，年轻一代是践行孝道的主体，推动年轻一代树立正确的孝道观，既有助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重要主体——青少年的孝道素养，也有助于推动其政治社会化进程，最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梁寨镇辖下的各村都积极宣传、打造自己的孝道氛围，有些村树起了孝道墙，以生动形象的墙绘方式为青少年和其他村民讲述“二十四孝”故事，贴近生活，易于理解。

在2015年11月的“双善双争”活动评比中，共评选出优秀党员20名、梁寨好人20名，为建设美好梁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梁寨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有晚唐的娄子寺、宋朝的“程子书院”、清朝的状元李蟠以及古黄河决口冲刷而成的渊子湖，千年的历史成就了小镇的名气^[14]，但其没有简单地将文化作为旅游产业资源，而是把传统文化与现实的社会治理需求相对接，努力打破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

四、乡村治理利用传统文化的价值

吸收和利用传统文化，需要选择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新旧交融的特性。当前，在大力复兴和全社会的合力建设之下，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被客体化的资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软控制手段和实现自身新发展的重要生发点。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对接，让基层社会治理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人文品格和思维方法，是改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实效的重要路径。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利用传统文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呢？

徐州梁寨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在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梁寨没有形式化模仿甚至拆真造假，而是以保护和还原的方式把自身具有突出特色的状元文化等进一步外化、固化，在当地营造耕读传家、学研进取的外在环境和氛围。

第二，紧紧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利用与当地的社会治理结合起来。梁寨以历史资源复原或保存的方式营造积极进取与讲求和合相统一的外围治理环境；以发动社会力量资助教育和发起“双善双争”评比活动，形成进取精神与和合性格相统一的内在引导机制；以建立乡贤工作室，调解多元矛盾、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难题为抓手，形成外在的文化治理载体。

第三，对传承和利用传统文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服务工作，作出统筹规划。梁寨镇党委和政府全面规划全镇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复原和保护既有的千年古文化建筑，布局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构建“五位一体”的治理网络，镇干部、村干部、普通党员、乡贤（大老执）、梁寨好人五种角色，五个层次，在梁寨镇的农村社会治理中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将梁寨农村社会纳入一张精心编织的立体治理网络中。

第四，注意发挥农村优秀干部、道德楷模、身边好人等“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建设乡贤工作室。新乡贤是传统

和合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在乡村治理中,梁寨镇积极鼓励乡贤回归,弘扬乡贤文化,凝聚乡贤力量,借助各类乡贤的财力、智力、影响力,加快乡村建设^[15]。例如,用各种激励机制鼓励群众争上各村道德榜;又如,呼吁德才兼备的新乡贤回乡建设新农村,特别是请退休的干部、专家、学者、商人回乡安度晚年,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等反哺桑梓;同时,把乡村中有威望、有能力的经济能人、退休干部、复退军人、外来工代表等培育发展为介于民间与政府之间的新型社会组织,让他们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以利用其非正式权威的影响力,在乡村治理中发挥辅助“村两委”的作用,成为具有非官方性质、能够解决后农业税时代政府治理能力不足^[16]的新型社会治理力量。

第五,重新理解和合文化中的孝道,为治理所用。“百善孝为先”,孝道文化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是历史沉淀而依然在我国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道德文化要素。孝道的基本内涵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理念和尚德、敬德的明德思想。其对仁爱、明德等思想的崇尚,能够与社会治理目标相对接:一方面,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为社会治理提供文化基础和道德支撑,进而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思想能量。孝道文化所提倡的价值准则和价值目标,经过世代传承、熏陶,已经被大众接受和认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只需要通过教育、劝诫等方式,使孝道文化渗透到社会治理之中,就能促进人们将其内化为一种自律的道德品性。

第六,重新审视和认识传统文化的治理功能。从梁寨的“双善双争”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价值建构方面的治理功能;从梁寨的乡贤工作室,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矛盾化解方面的治理功能;从梁寨的众筹资助教育和古建筑、文物的修缮保护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治理功能。我们相信,传统文化的治理功能还有更大的挖掘和利用空间。

参考文献

[1][2] 沈尚武、袁岳:《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缺憾》,《科学·经济·社会》,2012年第4期。

[3] 刘奇葆:《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求是》,2017年第8期。

[4][8] 贺少雅、毕啸南:《传统文化资源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和转化——以山西省闻喜县寺底村为例》,《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年第1期。

[5] 湘西州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地域环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站,2017年3月5日,http://www.xxzf.gov.cn/zjxx/xxgk/dyhj/201409/t20140901_133839.html。

[6][7] 邓崇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

[9] 材料来自笔者《江苏徐州调研日志》,2017年4月。

[10] 李良:《梁寨镇民营企业家长捐资助学献爱心》,丰县梁寨镇人民政府专栏,2017年6月26日,http://www.chinafx.gov.cn/Gov/Article,asp?id=115&ClassId=10&articleid=99823。

[11] 张文举:《梁寨镇五位一体联系服务群众》,丰县梁寨镇人民政府专栏,2015年8月14日,http://www.chinafx.gov.cn/Gov/Article,asp?id=115&ClassId=10&articleid=83628。

[12] 张文举:《梁寨镇农村党员网格化助力农村环境整治》,丰县梁寨镇人民政府专栏,2015年9月8日,http://www.chinafx.gov.cn/Gov/Article,asp?id=115&ClassId=10&articleid=83628。

//www.chinafx.gov.cn/Gov/Article,asp?id=115&ClassId=10&articleid=84491。

[13] 刘洁:《德孝道与社会治理》,《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7年第3期。

[14] 丰县新闻网络中心:《丰县:梁寨镇入围“2016最美中国榜”》,中国徐州,2016年9月13日,http://www.xz.gov.cn/zgxz/zwgk/20160913/008013_ef69ec88-e346-43a0-9bb9-7daef3756870.htm。

[15] 付翠莲:《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地方治理研究》,2016年第1期。

[16] 吉青:《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的推动力分析》,《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